



【中国观察之乐毅专栏】

容忍“考霸”背后的制度漏洞

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考霸”——四川南充考生张非录取一事，近日尘埃落定，张非今年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录取了。

(《华西都市报》7月16日)

看来，清华最终还是宽容了这位有“职业考生”之嫌的张非。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此愤愤不平，说张非挤占了本应是应届生的升学名额，清华再度录取他是对中国高考制度最大的讽刺，我们应当设法堵上这其中的制度漏洞，例如规定：退学两次或以上者，不得再次参加高考。

我承认，无论张非是因网瘾还是因当“职业考生”而两度退学，他的现实经历都已经证明，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漏洞的，可以为“职业考生”提供生存的土壤。但我却以为，这个制度漏洞应当被容忍。换言之，我们不能制定政策，限制高校退学生重新参加高考。

这个制度漏洞虽然存在，但可被利用的概率却非常小，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有本事通过考高分，进出北大清华如履平地的人，全中国也不会有多少个。而且大多数有这个能力的人，也不会去挣这份“工钱”。更重要的是，如果

我们限制高校退学生重新参加高考。那么，固然是可以堵住“职业考生”的生财之道，但同时，我们也扼杀了因为不可抗因素而正常退学者重返高校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非人道的。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一个人因为生病而退学，病好以后再考入，不久以后，又因家中出了特殊状况，不得已又退学去打工养家，情况好转以后，这个倒霉的人难道就无权再进高考考场了么？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人们对制度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出了问题，大家首先都会去考问制度是否有漏洞，这当然是一个好习惯。但矫枉过正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完美癖”，对制度的完美过度苛求。可这个世界上绝对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再好的制度也会有漏洞。这些漏洞有的是设计时考虑不周，可以改进。但有些漏洞却是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所注定的。这样的漏洞就很难改动，人们只能容忍。例如刑法中的“宁纵勿枉”原则。由于技术的局限，总有某些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收集不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全世界都知

道他犯了罪，也只能放了他。因为如果不依证据定罪，则很可能冤枉无辜者。宁可错放坏人，也不冤枉好人，是现代司法在制度设计时就预留好了的一个“漏洞”。

同样的道理，现行高考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保证每个人都有公平的考试机会。无论出身、性别、年龄、善恶、参加考试的目的等等，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人要利用“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造成的制度漏洞，做“职业考生”挣钱。在制度层面上，人们恐怕也只有容忍。因为动摇“在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则，就会动摇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而现行高考制度在目前中国的现实中，作为阶层流动最重要也最可靠的一个通道，还是不可以动摇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对于“考霸现象”就什么也不能做了。首先，整个社会要减少对状元的崇拜，杨绛先生就曾说过，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没几个是有出息的。其次，今后不良学校炒作状元时，媒体要多关注关注该状元的背景，把那些“职业考生”曝光，断了不良学校的财路。

(作者乐毅系自由撰稿人)



【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

别用纸面数据忽悠购房者

住房分成保障与商品住宅两部分，通常人们认为政府需要解决的是保障型住房，而不是商品房的价格。如果将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纳入保障型住房供应系统，房屋的均价就会下降。据估计，廉租房的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

从2003年8月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开始，以住房拉动内需政策启动，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被驱赶入商品住宅市场，我国的房产价格就坐上了火箭。

近日有关部门表态，政府对住房问题开始两手抓，一抓抑制需求，二抓扩大供给。为缓解房价上涨的民意压力，有关部门再次提出增加土地供给和扩大廉租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给平抑房价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增加的土地面积确实到位，二是必须有针对性地针对某种住宅的土地供给。这两个条件的落实，不仅有赖于政府的决心，还受到现实的抑制。纸面计划的供给增加与现实供给的增加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以北京为例，这两年政府的土地供应计划有增无减，但真正落实难度颇大。去年北京市国土局完成全年供地的计划中，经济适用房和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占了31%。而这些所谓的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用地全都不是面向社会民众的用房，而是仅面对特殊单位群体的住宅用地。照此逻辑，今年在计划与实际之间依然会存在缺口。

由此看来，要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政府必须加大反腐与廉租房的建设，但后两个方面的成绩仍未能得到数据支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任兴洲近日提出“公务员住房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揭开机关单位揩经济适用房优惠政策集资建房的冰山一角，这种赤裸裸的腐败与经济适用房的寻租现象交杂在一起，形成了牢固的利益链。廉租房的建设也不尽如人意，廉租房的核心难题建设资金至今未能解决。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早在去年7月，建设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就联合下文，要求各地拿出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用于廉租房建设。但

此事知易行难，据称，去年北京廉租房建设资金来源只有公积金增值收益，而财政资金一分钱也没到位。相对应的数据是，据粗略估算，到2009年年中，北京可以提供的廉租房只有1000套左右，但《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年—2010年）》所提供的数据为1万套。

实际数字说明一切问题，房地产市场牵涉到土地、融资、投资等各种领域，情况极为复杂，绝不是弄几个纸面数据、画几个饼就能在市场上体现出来的，需要大量基于实践的具体而复杂的工作，同时政府必须将国有土地的收益切实让利于民，否则，这一死结无法打开。

目前在杭州等地实行的保障型住房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信息公开，社会监督，那些决策者不妨吸取来自于实践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同时，引入国外用于普通收入阶层的优惠融资体系，改变目前公积金低效而官僚习气十足的资金利用方式，这才是中低收入阶层购房者的福音。

(作者叶檀系资深财经评论员)

“七成美国人有房产”难堪了谁？

■今日视点

美国有多少人拥有自己的房子，这看起来跟咱们中国人没什么关系。但如果老有专家和政府官员拿“美国人自由住房率低、租房率高”来证明我国的房价高涨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形成租多买少的“正确观念”，那美国人的自由住房率到底有多高，可得好好说说了。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说：“我就任时，布什总统曾让我减少美国的无房人口比例。目前美国拥有自己房产的人已经达到了70%，但这和北欧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在瑞典，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了88.5%。”

(7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什么？70%的美国人有自己的房产！部长先生，我可没听错吧。要知道，在这之

前，专家和学者已经无数次地教导我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租房的多，买房的少，中国老百姓也应该尽快转变观念，大家都去租房而不是买房，这房价自然就会降下来了，这不存心让人难堪吗？

我们都应该知道，你身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所掌握的数据当然要比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要准确得多。但问题是，你现在这么不顾后果地说出这番话，让那些之前无数次鼓吹“发达国家租房多、买房少”的专家学者怎么办？站出来跟你论战吧，估计他们会有点心虚。就此默默地认错吧，却又会大大损害那些专家学者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哎，阿方索·杰克逊先生，你说你这不是添乱是什么？

本来我们在专家学者的教导下，都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与国际潮流之间的差距——房价那么高，地方政府没责任，开发商也没有责任，有责任的只能是我们这

些一心想买个房子的思想落后者。所以，既然自己的观念实在转不过来，房价再高咱们也得扛着。你现在来告诉我们，美国也在努力减少无房人口比例，美国人的房子也跟我们一样是买的多租的少，不是一下子又把我们的怨气给勾起来了吗？阿方索·杰克逊先生，你这一番话会造成中国楼市的不稳定因素你知道吗？觉悟真叫一个低。

阿方索·杰克逊先生，虽然你让我们知道了“发达国家自由住房率高低”的真相，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或许专家学者们在此之后不会再傻到用“自由住房率”来忽悠咱老百姓了，但没准过不了几天，人家又会找个新的概念来忽悠我们了。到时候，谁来帮我们分辨真伪？阿方索·杰克逊先生，你是不知道，像你这样“不懂规矩、口无遮拦”的专家学者，我们这儿可实在是太多了啊。(冬晖)

“不捕不诉”是盲目的接轨

■热点纵论

郑州轻微刑事案件可不捕不诉引发激辩。“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不捕不诉的做法，其实并没有降低执法标准。”7月16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自民针对质疑作出回应。

(7月17日《法制日报》)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轻微刑事案件非诉讼化处理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潮流。但我们在与国际潮流接轨前一定要明白国际上轻微刑事案件的概念，他们往往是指违警罪、超速驾驶等犯罪，而我国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犯罪，只是将其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也就是说，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本身是排斥了违警罪等轻微刑事犯罪的，而只包括那些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司法实践中，

如果对于国外的一些规定生搬硬套，动辄以轻微刑事案件为由予以不诉，操作不当就极易成为一种法外开恩，有损法律的严肃性。比如说，在我国没有暴行罪的情况下，就不宜认为那些致人轻伤的犯罪是轻微犯罪而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在很多国家，运用暴力即使未致人伤害也会认为是犯罪)。

一个法治国家应该以悲悯的态度立法，而应该以严厉的态度执法。而当前在司法实践中，执法者执法态度的软化，却在危害着社会的秩序与人际的平等：往往打着宽严相济的名义对于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处理，损害人与人法律面前的平等。而人性理由的滥用，则使得司法权威受到了挑战，也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邹云翔)

单边收取印花税建议等待回应

■公民发言

《东南快报》7月17日报道，在一场资本网络论坛上，印花税成为讨论的热点，面对股市持续走低以及成交量再度跌破千亿元，与会专家称，近期市场低迷是印花税调整的直接结果，并表示希望印花税由双边征收改成单边征收。

放眼全球120多个国家(地区)的税收情况，据介绍，只有不到20个国家(地区)在收取证券交易税。也就是说，超过80%的国家是不收证券交易税的。其原因是这些国家认为证券交易税有碍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的繁荣。在收取证券交易税的20个国家中，仅澳大利亚、中国(包括中

国香港)，为双向收取证券交易税。而我国目前股票交易除了要交3‰的印花税外，还要加上3.5‰的固定佣金，实际上投资者的单边交易成本为6.5‰，双向收取已达13‰。

在民意愈来愈被管理层重视的今天，作为涉及面颇大的印花税问题，经济专家和普通民众的呼声和建议不应被搁置一旁。股市持续走低带来的社会消极效应，也不应被决策者忽视。单边收取印花税的建议值得有关部门考量、斟酌，人们更期待，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能就这一建议予以积极回应，在诚挚的互动、探讨中达成最大的共识。

(吴杭民)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对孩子的“精神虐待”更需关注

■公民发言

在浙江省“预防儿童伤害与忽视”项目区级工作组成立大会上，不少家长代表都认为，在现代社会，家庭里已很少对儿童有暴力。但专家表示，向儿童大叫或尖叫，拒绝与儿童谈话，要求儿童做某事……都属于对儿童的暴力。

(7月17日《今日早报》)

家长和专家在对待孩子教育问题上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暴露出家长们在“爱”与“教育”中的一种普遍问题，也就是说，相当多的家长并不懂得怎样爱孩子和怎样教育孩子。

正是在“爱”的名义下，家长们常常误入歧途，使得家长们对儿童的精神虐待时刻存在。譬如，强迫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什么钢琴、书法、舞蹈……家长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剥夺了孩子们多少自由，违背了孩子们多少意愿，侵占了孩子们多少

时间。而孩子们只要表现出不愿意，家长们往往就会教育孩子“你真不懂事，伤了妈妈的心”等等，搞得孩子倒像犯了多大的错似的。

2005年，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国内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儿童暴力调查，近期，相关课题组也对浙江省的804名大中专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童年期的被虐待经历与心理健康有明显的关联。与童年期没有被虐待经历的学生相比，有过被虐经历的青少年，他们总体幸福感明显偏低，而出现自杀意念的比例明显偏高。这种结果，应该引起家长们的警惕与反思。至少我们应该明白，“错爱”其实也是一种精神虐待，往往会展出畸形的果实。而这种“恶果”，则多半要由家长们自己来消化。因此，从现在起，请学会尊重孩子，因为只有尊重才是爱的基础，而“强迫”则是错爱甚至是戕害的表现。

(张兰英)

银行排队难题唯有靠竞争解决

■公民发言

银行排队难题已经困扰人们很长时间，在民怨和舆论压迫下，今年4月份几大银行曾经纷纷推出各自的应对办法。但近日的有关调查却显示，排队难题未能有效缓解。据报道，国内市场研究公司CTR日前对北京西城区的10家银行网点进行了一番暗访调查，结果发现，排队问题在大多数银行仍普遍存在。

银行排队难成为一个各方意见颇大的民生问题，大约与股市走牛有关。因为在2005年以前，虽然国有银行的服务不敢恭维，排队难却也不如今天这般成问题。而就我一直印象比较良好的招商银行来讲，2005年以前似乎不存在排队的问题，但股市一牛起来，几次去招行办理业务，却也都毫无例外地需要耐心等待。

客观地说，面对舆论压力和现实难题，银行也的确在想办法。例如增加营业时间和自助终端，

提高ATM单笔取款上限，甚至上海还向当地银行发出了“排长队不改进将受罚”的通牒。应该说，这些措施多多少少也都起到了点作用。但总体而言，我个人不相信在目前的状态下，银行能够有效地解决排队难题。“目前的状态”大约基于两点：一，出于成本考虑，短时间内无法指望银行大幅增设网点。二，中资银行虽然面临竞争，但竞争强度目前并不足以迫使其实显著提高服务水平。垄断抑或卖方市场，仍然是国内银行心情愉快的根本。

理论上可行的应对难题之道，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就可行。在CTR的暗访中，“仅有招行和工行的柜员主动向客户推荐以后可以通过自助设备办理，其他银行则没有任何表示”。不难想象，又有多少银行能够主动帮助不熟悉自助设备的客户办理业务呢？在我的经历中，只有在招行享受到这样的服务。而就这一点不同，却也真实透露了不同银行的差别。

(徐冰)